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〇三期 ——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5g)

【本刊专稿】	接近真相——《红卫兵兴衰录》出版说明	余汝信
【回首文革】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骆小海
【书评】	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	何蜀
【不堪回首】	探访重庆“文革”墓群	尹鸿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接近真相——《红卫兵兴衰录》出版说明

• 余汝信 •

(一)

宋柏林是笔者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文革前一年，他随家北迁，转学到了北京清华附中。柏林有此大伙儿都极艳羡的“幸运”，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却是有赖于当时军内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新北京”地区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1961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1964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1965年3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销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任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木式）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1965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却又写道，1966年8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毛泽东批准，总政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页676—678）。

稍为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1966年8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而日记，只要是未经任何事后删改“润色”的原始文本，那么，它以自身固有的不可置疑的真实性优势，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功能方面，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可靠度方面，都是回忆录所望尘莫及的。笔者近年专注于文革史原貌的恢复工作，得知宋柏林竟然保存有这么一批自1963年以后四十多年间从未中断过的日记，大喜过望，征得其同意，将认为最有价值的涉及红卫兵前期史的一段加以适当注释，公开出版，以飨读者。

（二）

众所周知，“红卫兵”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符号，诞生自清华附中。故而，无论从狭义的抑或广义的概念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群体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之为“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首先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呼喊出来，得到毛泽东首肯，迅速风靡全国。而文革中毛泽东唯一一封直接致红卫兵的支持信，也是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的。

文革前，清华附中与北京四中、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一〇一中齐名，德智体整体教育水平在北京名列前茅。据1966年访问过该校的日本历史学家竹内实称，时该校有学生1300名，高峰时有红卫兵265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0%。作为红卫兵的主要核心成员，宋柏林经历了这一群体酝酿成立、叱咤风云，以至迷惘消沉、溃散式微（一小部分人从中得以觉醒）的全过程。他此时期的日记，逐日记之，无一间断，以其视角所及，见证了这一群体的发展与沉沦，展现了他自己在运动进程中的所思所虑，亦厘清了一些似有定论实欠清晰的历史细节。

为此，本书将宋柏林自文革发动阶段即1966年5月至其当兵前夕即1968年2月的日记全部刊出。至于1966年1月至4月部分选刊，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学生普遍性的思想动向以及整体的政治氛围，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怎么样的土壤。

笔者认为，宋柏林日记向研究者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是多方面的。

例如，按目前公认的说法，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日期被定格在1966年5月29日，这一天甚至被认定为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成立日。而据宋柏林日记，6月3日出现了“红卫士”这一名称，并称该日“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这使研究者有理由相信，“红

卫兵”并非是该群体最早的、唯一的名称（据骆小海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张承志小组墙报的笔名是“红卫士”而非“红卫兵”）。5月29日被称之为红卫兵成立日，不过是事后的人为“认定”而已，将成立日认定在6月3日，应亦无不可，而且可能更为接近事实真相。

例如，据1966年6月25日日记，清华附中红卫兵日后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及续篇《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刊载于同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及《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部分文革史论著将这张大字报的标题说成一开始就是后者，显然有误。

例如，据1966年7月28日日记，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的全海淀区左派学生与周捷辩论会上，“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后发了言，读了三篇造反精神万岁。江青等同志很注意我们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大力赞扬支持我们造反”。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而经骆小海在本书序言中补充的是，就在这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邝桃生把《一论》《二论》造反大字报的抄件（缺三论）递给江青，附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

再例如，据1966年8月2日日记，宋这一天“跑了矿院、石油、人大等附中”，“从矿院附中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8月2日，不过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作为会议文件之二印发的毛的信已流传出来，这比一般所说的8月3日王任重将毛的信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流行说法再提前了一天。日记证实了流传出来的管道不止一个，既有官方的（主管北京中学运动的王任重），也有非官方的（如宋柏林所得到的）。

将历史的细节一一梳理清楚，目的不外是为求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为探究细节而细节。以上述后两日日记所揭示内情为例，我们今天与其不厌其烦谴责这些站在前台的十几岁青少年，不如如实指出那些利用未涉世事的中学生的幕后大人物。

（三）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北京中学“老红卫兵”（“老兵”）的一分子。所谓“老红卫兵”，以笔者之见，即为1966年6月反校领导阶段已纷纷成立的，以革干子弟为骨干，“红五类”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老兵”此一群体，极有别于1966年10月反“资反线”后才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红卫兵”。

宋柏林日记应可使研究者对于“老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以日记中反映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例，反校领导自1966年5月中旬已是“风起于青萍之末”，6月初，达致高潮。反校领导的原因，先是“学校有资本主义教育方向，办预科就是与党提出的半工半读唱反调”（1966年5月25日），又有“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1966年6月4日）以及“扮演资产阶级保皇党的角色，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依靠……，打击工农革干子弟，对革命派实行专政”（1966年6月7日）。

6月8日，工作组进校，至7月29日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为工作组主导运动阶段。红卫兵初期欢迎工作组，工作组也肯定红卫兵。7月上旬，红卫兵与工作组产生意见分歧，7月中下旬，分歧深化：“张田丰又是大暴露，形势突变，看来革命风暴，更巨大的就要来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1966年7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声称，“派工作组的作法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要破除迷信，破除旧习惯势力，撤销一切工作组，由师生自己教育，管理自己，自己革命，一切权力归革委会”（1966年7月26日）。

伴随着“红八月”到来的，是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意气风发地走上天安门城楼，以及“红色恐怖”的盛行。这一时期的特征，在日记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关于血统论“对联”：“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好得很。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必须造成短时期的红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在表现’的余毒，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权牢牢地把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1966年8月4日）。

如关于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与十二个学校加上大学各系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拉倒二校门，撕掉了那些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1966年8月24日）。

如关于学生打学生：“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1966年8月26日）。

此外，日记对“联动”的活动，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也有较详细的反映。

笔者注意到一些老红卫兵的回忆文字，对于反校领导、反工作组，多少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及。而对于带有强烈血腥味的“红色恐怖”时期，则大都刻意回避，这就是“选择性记忆”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回忆文字可以回避，日记却不能回避，除非你对其进行了事后的加工剪裁。本书将这一时期的日记原文照登，应能帮助日后的研究者以全方位的角度审视老红卫兵群体的全部所作所为。宋柏林毫不保留地将当日的思想、行为袒露于人前，颇具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气，实质上亦是其个人对这一段不堪回首往事的沉痛反思。我们以日记原始文本的方式还原这一段历史的极终目的，套用一句老话，无非也是给世人以警示：决不能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四）

1966年9月，宋柏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串联。“十一”期间，他继“八一八”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惟与“八一八”相比，他的革命狂热已大部冷却，冷却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有了第一次串联所见所闻的冲击，10月中旬，他对学校的运动已很不感冒。日记忠实纪录了他的急速转变：“形势变化真快，思想变化更快。上午与刘泽鹏交谈了许久，已决意出走，去游尽祖国名山圣水，去大开眼界，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大，有多美，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战斗”（1966年10月14日）。

宋柏林属于“老兵”中偏于温和、讲究策略的一翼。“红八月”社会上的“破四旧”以及年底“联动”的活动，清华附中红卫兵似乎也未认真参与。故而直到1968年2月当兵前，除偶尔回校应付一下“复课闹革命”外，他全部的心思就是读“杂书”和以革命串联为名义的外出游历。

1966年10月后的日记，使我们认识了与此前6—8月时完全不一样的“老兵”的另

一个侧面，而这一个侧面，却是往日的研究者常常忽略了的。

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部队大院与学校围墙以外的世界：“红卫兵全国大串玩是当今潮流，但此流不可久，久则工农兵必激愤。串联变串玩，此乃路人皆知的事实。其实也是好事，是对中国书呆子们的一次大解放”（1966年11月15日）。

串联使他了解了红色中国真实的另一面：“早上8点，下了火车就来到了被白雪覆盖着的‘兰州市’。一进车站外的食堂，首先就遇到了许多讨饭的人——小孩、大人、老头，男的，女的。我感到特别新奇，在如今的社会中，竟然还有这等事”（1967年1月30日）。

“我们是坐在一个运铁条的车箱里的。同坐的还有一对老头老太婆，是到外逃荒要饭回家的。他们是向工人要饭票买馒头，只半个月就要了一大麻袋送回家给娃娃吃，他们自己吃的还不算。他们是甘肃的，说他们那地已干旱4、5年了，年年没收成，每人每月18—20斤红高粱，吃不饱，所以老人小孩多跑出来要饭。每个生产队有2、3人要饭就很多了”（1967年5月22日）。

串联之外是读书。1967年一年间，宋柏林读了六十多本书：《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金陵春梦》、《赫鲁晓夫主义》、《新天方夜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新编》、《彷徨》、《呐喊》、《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大策略家》、《初刻拍案惊奇》、《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战争与和平》、《斯大林时代》、《侍卫官杂记》、《州委书记》、《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国演义》、《茹尔宾一家人》、《金星英雄》、《虾球传》、《傻瓜威尔逊》、《青年近卫军》、《匹克威克外传》、《八十天环游地球》、《红楼梦》、《贵族之家》、《世外桃源》、《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唐·吉珂德》、《嘉尔曼》、《九三年》、《震撼世界的十天》、《牛虻》、《近代世界史教程》、《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两姐妹》、《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东周列国志》、《联共（布）党史》、《十日谈》、《红与黑》，等等。

上述书籍，相当一部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文革中却大部列入“封资修”一类。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宋柏林几乎每本都写下了详略不一的读书心得，部分读书心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颇有见地。宋柏林还写下了不少读书摘要，为保持日记的完整性，本书亦加以保留，从中亦可窥见他当年的关注所在。

宋柏林的读书记录，使我们找到了一个号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实质禁锢一切的“红海洋”里真实的异类个案。剖析这一个案，使我们发现：仅仅两年间，宋柏林简直判若两人！“八一八”的狂热如此神奇地异化出思考的一代，这，应该是那一个可诅咒的年代最有价值的副产品吧！

（五）

日记此种文本在作为史料使用时，最主要的缺陷，恐怕就是记录者所处的位置及视野带来的局限性。如宋柏林，他在文革前期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净化和修养，对身边以外、学校以外的宏大事件，反应和观察都是比较迟缓的。

本书试图以注释的方式扩阔、补充日记中未能完全反映，而日记作者又有所接触的人和事的背景材料，并尽其所能地将这些背景材料介绍得更为客观、准确和公允。注释参考了如下一些文献数据：

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6—1968年。
2.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组织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4集，1966年。
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4集，1967年1—5月。
4. 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等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1967年2月。
5.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档汇编》，1967年5月。
6. 文艺革司武汉话剧院总部翻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汇编》，1967年11月。
7. 武汉钢二司新华师总部编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电影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1967年11月。
8. 福州军区政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1968年2月。
9. 江沛：《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11. 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编：《开国将帅》，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12. 卜伟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前前后后》（1992年2月），《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2001年第80辑）。

注释以简略明了为原则。为使读者了解日记作者思想发展的轨迹，对其看过的受批判电影，革命样板戏，内部书籍及中外文学、政治著作亦作了简要注释，而一般性影片，读者所熟悉的中国古典、现代作品未有加注。

除明显的错别字外，日记原文未作任何改动。日记中明显的人名、地名错误，在原文中亦不作更正，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本书收录了数十幅日记作者所珍藏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作者从记者手中取得的几张之外，大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又收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有影响的几篇大字报。相信这些极富历史现场感的照片和带有强烈文革语言色彩的大字报，可使本书更具可读性。

何蜀、马海甸及卜伟华先生分别为本书的注释提供了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和原始素材，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6年3月10日

~~~~~

## 【回首文革】

###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 骆小海 •

我是宋柏林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更不知道他四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产生了整整四十本日记；特别是，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一天都没有中断，且保存完好。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觉得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段史实有史料价值，决定把涵盖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余汝信对日记中提及的人和事，作了力所能及的注解。

日记题材的书，我觉得最有味道的当属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出版并在大陆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1）。该书描写了蒋介石官邸的日日夜夜。情节连贯，文笔生动流畅，妙趣横生，

远胜同时期流行的《金陵春梦》〔2〕。不过该书乃文学作品，并非史料。

我通读了宋柏林日记中准备出版的部分后，感到即使有注解，如果没有背景交待，读这样的原始资料，必定会一头雾水。毕竟不是《侍卫官杂记》式的文学作品。柏林兄请我作序，我想何不借此机会补充一点背景介绍呢？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1964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朝，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3〕。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4〕，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〇一中〔5〕，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着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6〕《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1963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1965年10月24日星期天，我和预科652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651班的同学当

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1966年5月1日—3日，我们预科651班的11位男女同学借着学校放4天假的机会，带着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651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獐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5月10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651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651观点”。预651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651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651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651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651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5月20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7〕。次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



动。后来，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5月30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8）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6月2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6月8日，外校学生300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10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6月8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9）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6月23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6月24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6月25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7月4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6月9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7月1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7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7月26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于7月27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7月28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7月31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8月2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8月3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关系好；北大附中“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8月13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

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胡耀邦等三位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8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平民着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1966年7、8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挣扎着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651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651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8月6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8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8月26日，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and 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

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天，8月27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8月25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着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我是9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着：“主席，救我一命。”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着面子，硬着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10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6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街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8月4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8月6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8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8月24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1966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8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12月26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着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1967年1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1967年1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1967年4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1967年4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师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4月22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伙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1966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66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1967年2月，北京一零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形势的发展，与友人的交流，读书的思考，使我逐渐认为，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实为神经路线。

1967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着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2006年2月28日草 4月19日改定

- （1） 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
- （2） 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
- （3） 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
- （4） 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
- （5） 北京一〇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
- （6） 朝鲜唱剧：20世纪初从朝鲜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
- （7）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
- （8） 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毛泽东的。——小海注
- （9） 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

【书 评】

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
——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在读到这部日记之前，我心目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那些首创红卫兵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的中学生们，只是一些自恃“血统高贵”而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一些狂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愚蠢口号，任意打同学，打老师，制造“红色恐怖”，践踏弱势群体的当代“高衙内”。尽管他们当中后来出了个张承志这样有才华有影响的作家，但也并不能改变我对他们的整体印象。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的宣传，还有他们自己留下来的那些杀气腾腾的传单，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而这一部日记，却使我对他们有了全新的了解。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本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

在读这部日记的许多篇章时，我都忍不住会发出惊叹，发出感慨，会恍然觉得是在回顾自己过去的心路历程，尽管当时我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宋柏林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我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成为“社会青年”，一年后外出做临时工，在深山工地上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但宋柏林日记中的许多文字：却像是我当年写下的一样，我当年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就是这样认识社会的，就是这样“清教徒”似地鞭策自己力求“革命化”的，就是这样站在“革命批判”的立场上评价文艺作品的……甚至宋柏林日记中记载的那些他读过的文学或政治读物（除去个别当时内部发行的政治读物我这样的平民子弟不易找到外），也大多是我读过的，只是读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如《斯大林时代》，我是在“文革”前夕读到的，凡尔纳的那些科幻惊险小说和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等都是上初中时就读了的；而《州委书记》、《怎么办》、《苦难的历程》、《震撼世界的十天》、《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我在1968年以后才陆续读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宋柏林说：“是最脏的书之一，我只翻了一点”，我也抱有同感，看不进去，也“只翻了一点”。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宋柏林硬着头皮“花了五个日以继夜的劳动”读完，作了一些批判性的评价，而我当时则干脆就拒绝读它。因为在“文革”前我就得知：不少青年人在“反右派”运动中“堕落为右派”就是因为中了这部小说宣扬的“个人奋斗”思想的毒……

宋柏林这部日记使我想了许多。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家庭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人生遭遇不同，但我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受的都是一样的教育，喝的都是一样的“狼奶”。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

多年以来，对一度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动力”的人们，无论是早期的“老红卫兵”，还是后来的造反派，都有许多脸谱化的宣传，给人们造成了不真实的印象。实际上，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历史事件里一度引领着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们，也必定是很复杂的。宋柏林这部日记，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当年一部分“革命小将”的内心世界，对那场“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可能发生，以及发生过程中的若干曲折，有着比查阅历史档案或报刊资料更感性、更具体、更生动的了解。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日记，此前我已经读到过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葛剑雄编的《谭其骧日记》，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但这些日记都是从知识分子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角度，从“文化大革命”受难者的角度写的，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有限，审视

“文革”的角度比较单一。作为“文化大革命”舞台上主要角色的红卫兵的日记，此前也看到过两本，一本是北京出版的一个女红卫兵的《红色少女日记》，有专家作注，还配有当年老照片，只是作者当年的经历比较一般，内容再经过“可以理解”的若干删节，大大减少了它的信息量和历史价值，读来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受。另一本是香港出版的《红卫兵日记》，作者用写小说的方式进行了大量不应有的“整理”加工，使得整个日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而宋柏林的这部日记，既从一个独特的而且十分重要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云，又十分真实地保留了原貌，像“活化石”一样为读者提供了极珍贵的史料。比如，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经过及当时的社会心理、时代氛围，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7月29日那次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报告会上讲话和毛泽东突然出现的情景，关于“八一八”的集会和在天安门城楼上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与毛泽东的见面，关于“红八月”，关于打同学……日记中都有详细生动的记载。请看这一则：

1966年8月26日 星期五 阴

半夜一连传来了3、4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文化革命要武斗，要流血牺牲。这使我更充分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从这些真情实感的字行间，可以读出很多东西。

日记中还有不少地方会使读者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宋柏林在“老红卫兵”的政治地位被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取代之后，跑出去串连，在青海，他却跟首都三司一起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八一八”，假如不是他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生的“赵永夫事件”中，说不定就会有他跟当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的身影甚至流在一起的鲜血……这对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而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到处都曾出现过的真实情况。有不少地方（特别是较边远的地方）的造反之火，往往是由一些在首都或大城市被视为保守派的红卫兵有意无意地点燃起来的。

此外，日记中关于外出串连时天南地北的风土人情、社会百态的记载，如车上遇见甘肃逃荒要饭的人，“说他们那地已干旱4、5年了，年年没收成，每人每月18—20斤红高粱，吃不饱，所以老人小孩多跑出来要饭。每个生产队有2、3人要饭就很多了。”在乌鲁木齐“我们吃了几串烤羊肉，八分钱一串……找不到一家像样的饭馆。据说这里很富，吃饭从不要粮票，但物价还是贵的。”在西安“睡了一晚旅馆，四毛一夜，大堂铺。”这类记载，都具有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

这部日记是作为“文革史资料丛书”中的第一部出版的。作为历史资料，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敢于不加删节，不加“整理”地公布包括许多个人隐私的日记，就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使我在读这些日记时不能不对作者产生敬意。这部日记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而且真实记录了一个当年“老红卫兵”核心组成员如何“从时刻想着‘中美大战’解放全人类的革命闯将，变成靠着‘邪门歪道’遍游南

北东西的逍遥派。从一个思想禁锢的‘清教徒’，变成兼收并蓄贪婪地汲取‘封资修’各种文化的‘异教徒’的心路历程。这对研究“文革”历史，研究“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这部日记能够在那样的动乱年代里几乎逐日地写下来，并且完善保存下来，也应该算个奇迹。众所周知，在那样的年代里，许多人命运难测，随时有可能被抄家，而且自从“文革”初期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地批判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之类杂文以后，自从破“四旧”大规模抄家以后，一般人就不敢再写日记，甚至不敢再保存笔记、书信之类文字资料（当年的居住条件，也使得许多人家根本没有办法保存这类东西）。而宋柏林却有特殊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如他说：“幸运的是本人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成为‘专政’对象，没有被抄家，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许多照片和文物，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实属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这块“文革活化石”是由长期致力于“文革”历史研究的余汝信先生发现并“发掘”出来的，他为帮助读者理解一些背景情况而作的注，和当年著名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骆小海写的序，以及作为附录的几篇重要历史文献，都增加了这部日记的分量。在今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这部日记的出版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但愿在这之后能有更多更好的“文革活化石”被发掘出来，能有更多更好的这样说真话的、真实反映“文革”历史的出版物奉献给读者。

2006年4月15日于重庆风江阁

~~~~~

## 【不堪回首】

### 探访重庆“文革”墓群

• 尹鸿伟 •

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座“文革博物馆”。——巴金

2005年12月，一则令许多中国人吃惊的消息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传入中国大地：曾见证“文革”血雨腥风、位于重庆的一座“文革”墓群（也称红卫兵公墓），因房地产开发即将被拆除。

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被广泛转载，这座平日里鲜于在媒体上露面的“文革”墓群，一时间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目标。一月初，当记者赶到重庆“文革”墓群时，看到不少参观者都是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专门赶来的。

## ◇ 偏僻墓园的历史记忆

从外表看，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墓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文革”墓群位于沙坪公园不显眼的角落，一个小山包上排列着110余座坟墓。造墓立碑时间从1967年6月开始，到1969年1月结束。埋葬的死者基本上属于“文革”期间重庆“815造反派”的成员，他们都是在“文革”武斗中的丧生者，也不乏个别无辜受害者及数名以前的解放军烈士。对比围墙外的熙熙攘攘，墓地里总是一片寂静，除了大门旁的墙上有人随意涂抹的“文革墓群”四个大字，外面再没有任何明显的标记。

墓园的布局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安排，而是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全无对称。沿着墓群中间的小道，可以很容易就走进了墓群深处。这里的风格很像西方的墓地，整体部局散乱却十分突出墓碑的个性，各种墓碑设计总能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影子，并且每个墓碑上都用图案或文字突出着“815”、“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一些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豪迈口号和墓志铭，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而许多墓碑上的内容，却是因为长年的风化、剥落，已经看不清楚或者不存在了。

曾经作为一个时代辉煌纪念的墓地已经被衰草无情地吞没了许多年。其情形经常被造访者们这样描述：“高耸的碑体，低矮的坟墓，残存的断壁，由于风化斑驳难辨的字迹，杂乱的草丛，散落的枯叶，凋零的树枝。”

平常墓群里很少有人，偶尔进来一两个，都是脸上布满了凝重，因为这里总是静得有些可怕，暗得有些阴森，闷得又让人喘不过气来。一名重庆老人半开玩笑地说：“在这样的地方，如果谁还能笑得出来，那不是圣人就是精神病人。但愿它像一艘船，能够载走那一切疯狂和苦难。”

在墓群的大门旁和各种墓壁上经常可以看见各种造访者用粉笔写下的“留言”和“感想”，尽管不断有风雨冲刷，但是仍然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在粉笔已经不常用的今天，很多留言者一定是有备而来。那些人是希望借这些历史寄托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绪。”一名经常在公园内锻炼的老人对记者说。

#### ◇ 重庆武斗的最后见证

重庆沙坪公园里的这座葬有400余人的“文革”墓群的重要性在于，它见证了“文革”期间闻名全国的重庆武斗，是国内惟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

1966年12月，上海率先打响了“文革”的全国第一枪，“文化大革命”逐步由文攻（批斗）演变为武斗，使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定格于1966年12月至1968年期间。而一直是中国工业重镇的重庆，更是在全国的武斗中“声名大振”。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中，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成为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到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

从各种已公开史料可知：1967年7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据史料不完全记载：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同日，武斗队又将坦克开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有参加过重庆武斗的人撰写回忆录称：“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

许多重庆老人都还记得，当年武斗中被叫做“战士”的那群年轻人，有学生，有工人，也有农民，个个都朝气蓬勃、英姿飒爽。还有人说：“尤其是造反司令部的一些文艺女兵，本身就很漂亮，再穿着一身海魂衫、白衬衫等服装，腰别一把小手枪，看起来特别精神。”

据官方资料显示，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分别属于两派的重庆造反派组织共发生武斗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24次，各种原因死亡645人。死者中年龄最大的为60岁，最小的仅为14岁，其中部分为女性。重庆武斗最后在政府和军方的压力下停止，两派头目随后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重庆武斗期间，在沙坪公园、北碚东阳镇石子山、潘家坪招待所、建设厂清水池、重庆大学松林坡、朝天门（其时被更名为“红港”）、街心花园……有不下20处地方埋葬着死难者，正式的“红卫兵公墓”至少有三处，它们都是由造反派们建设的“烈士墓地”。但是由于各种历史的风云巨变，它们中大多数现在已经无迹可寻了——或者被勒令搬迁，或者被直接铲除。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也没有人敢反对。

但是沙坪公园里这座葬有400余人的“文革”墓群却被意外保存下来，成为一个时代的背影，而且它的命运在后人的心目中也越来越奇特：或者满不在乎，或者价值无法估量。据各种有心人士多年考证，其为国内惟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

“文革”结束后，许多著名的作家慕名而至，用诗篇和文字述说着那段历史，据说伤痕文学第一部正面描写武斗的短篇小说《枫》，其构思最初即由此墓群引发。

#### ◇ “文革”的耻辱柱

对于国内外关于“重庆‘文革’墓群将拆”的消息，重庆沙坪公园管理处开发科的侯卫东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都不知道那些报道是如何出现的，完全是空穴来风。”他表示，尽管近年来公园内部进行过多次建设和改造，但是从来就没有去碰过“文革”墓群，“想都没想过”。

由于“文革”墓群建设在沙坪公园内，其已经成为公园管理处的工作内容之一。侯卫东说：“作为主要靠政府拨款的事业单位，我们公园并没有特别的经费，我们只能对墓群进行一些日常管理和简单维护，对于风化等问题，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去恢复。但是我们从来就不干涉游客去参观，特别是死者的亲朋好友。”

尽管在民间一直有许多人关心墓群的情况，网络上各种文字和图片层出不穷，但是随便在重庆大街上拉住人问，绝大部分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和方位，有些重庆年轻人更对本地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觉得不可理喻。现在沙坪公园内每天游客不少，但是从进大门开始都没有关于墓群的任何说明或示意。

侯卫东表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公园从来就没有将墓群当作一个宣传内容，当作让游客参观的一个内容，所以人们很难从公开的媒体上知道它的存在，基本上都是靠人传人，“在保护的同时一切低调处理”。尽管如此，这里经常有人造访，除了死者的亲友外，更有一些好奇者、“文革”亲历者和他们的子女。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目的，怀着不同的心事。

许多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将其视为“幽灵”，曾经强烈要求毁掉，它也几次险些因为公园建设被拆掉。1985年当地政府还引发了铲除和保存两方面的意见争持不下，而“保存说”最终成为结论。最后重庆市发文说：不铲除也不开放，墓地全封闭式围起来。地方政府为此拨

了专款，在此前敞开的墓地四周砌起了围墙，筑墙后的墓园方成现在格局。一名受过“文革”迫害的重庆老人说：“里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耻辱柱，一看见它们，想起它们，我的心就会痛起来。”

200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基本结论是，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然而，这段曾经影响两代人的浩劫史，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渐渐被后人遗忘。

知青出身的著名作家邓贤在得知国外“重庆‘文革’墓群将拆”的报道后表示：希望报道不是真的，重庆红卫兵公墓已经成为“文革”纪念碑，它所沉淀的历史内容远远超过公墓本身，如同秦始皇兵马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几个石人一样。他说：“随着岁月流逝，这座全国惟一完整的‘文革’公墓的意义还将继续显现，它终将超越时代和民族，成为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之一，虽然这种财富是沉重和触目惊心的，但将令世人警醒。”

□ 摘自《南风窗》2006年第1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